

文坛走笔

认识报人

□王蒙

我第一次与何东平同志见面,立即感到他必是一个优秀老练的报人。

他认真倾听,反应很快,总能抓住要领。他的言谈话语表达的思想清晰准确,恰到好处,你觉得对面是一个与你意会神通的人,有头脑,不乏味,有足够的知识修养。

读了东平同志的《把日记写在报纸上》,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他是一个广东客家的农村孩子,成长为光明日报社的总编辑,绝非偶然。参加过解放战争的父亲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后平反),对他的性格是一种磨炼;与家人一起被遣返农村,从事超出他体力的劳动,对他是一种身心的淬炼;当不上红小兵上不了高中,对他又是一种韧性的培育。他早就做好了准备:“那些好事一定不会

选中你,你能达到的,就是下功夫去自学,下功夫去锻炼,做一个人人都称道的人。”挫折使他好自学,淡定冷静,也使他得到了长辈的帮助、老师的信任、同学的赞扬,得到了各种办壁报、编小报、写广播稿、办展览的机会。最终,在1978年中央拨乱反正的光辉照耀下,他考上大学,进入光明日报社这个久已向往的新闻单位。

在中国的党报中,《光明日报》有着独特的地位。它是毛主席在西柏坡时建议创立的一份报纸,它既有党报的庄重,又充满文化信息与文化风度,我至今仍喜欢阅读。我本人也是《光明日报》的作者之一,自上世纪70年代起,先后写稿见报近140篇。从那些与我联系的编辑身上,我感到了《光明日报》这张报纸的敏锐、大气、高远。在光明日报社当总编辑,不

是容易的事。何东平同志从大学毕业到退休,在光明日报社工作34年,从记者编辑到各级领导直至总编辑,从小受到的各种试炼,都为报纸工作做了准备。他珍惜、感恩、敬畏,他眼睛向下,开门办报,不保守不塞听,有很好的沟通和捕捉能力;他做编辑有读者意识,“设身处地、视为己出”;他当记者确信“作家的笔调耐读”,得过不少新闻奖项。他说:“冷漠和无趣是新闻工作的天敌。”他深知党报责任重大、影响巨大,他既能把握大局,又在遵循、发扬、推进《光明日报》的特色上做出了新文章。他秉承“文化日记”“学术日记”的传统,他认为,读者看媒体,就是看“师、时、史、势”。他善于思考,总结出“对举思维”“避免隐性无良”的策划和编辑思路。他长于用短句、用细节、讲故事。他责任心强,在杜绝差错、打磨稿件方面总不满足,直至成为报

社“第一责任人”后,还习惯把“黄金傍晚”作为加班时间,“把休息和应酬时间压缩到最少”。

读了何东平同志此一自述,我对报纸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在那么多重大报道、典型人物、学术文章的背后,报社编辑记者付出了那么多的劳动和思考。我至今记得,《光明日报》1978年发表的石破天惊的大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给改革开放带来了根本性启发意义!《光明日报》的特色,无疑是一任接一任的总编辑带领一代接一代的报人辛苦采访、写作、编辑干出来的,何东平同志无疑是“光明风格”的一个优秀的践行者和建设者。我相信,还有许多同志,像东平同志一样,兢兢业业地工作着。

我向他们致敬!

(摘自《光明日报》)

心灵深处

富春江畔东梓关

□赵燕飞

一直喜欢郁达夫的作品,也很想去他的故乡看看。然而,在来富阳之前,竟不知他有这样一篇以真实地名“东梓关”为标题的小说。网上搜索时又发现,东梓关如今的名声更多地缘于它是现实版的《富春山居图》,设计独特的回迁安置房成了网红打卡地。只是,那些举着手机拍照或直播的人,有几个会想到郁达夫和他的作品?

我也是个俗人,对于东梓关的向往,并不仅仅因为郁达夫的那篇小说。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这样的情景:油菜花开得不顾不顾,黛瓦白墙的民居在花海之中怡然而卧,天空蓝得无穷无尽,白云在蓝和金黄之中悠闲来去……若郁达夫没有患上吐血病,若他的前程似油菜花般灿烂,他会写出怎样的《东梓关》?那种淡淡的忧伤和愁,会不会化作现世安好的沉醉?

年少时,因为胃病吃过很多中药。逼着我服用中药的,自然是母亲。母亲将那碗热气腾腾的药汤摆在我面前,盯着我眉头紧皱咕咚咕咚喝得碗里只剩一点点药渣。在郁达夫的笔下,那个名叫文朴的男人,也是在母亲关切的眼神里,前往东梓关徐家大院请人诊病。表面看来,郁达夫写的是小说,但许多时候,小说比现实更真实。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言说的东西,作家在小说中一吐为快。《东梓关》里,那个等待渡船的文朴,那个问路的文朴,那个期盼身体快快好起来的文朴,何尝不是现实生活中的郁达夫?

《东梓关》中的徐家大院,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许家大院,郁达夫当年的确去那里看过病,而我之所以来到东梓关,最重要的就是想去郁达夫曾经求医问药的许家大院看看。

兜兜转转,来到一口方方正正的池塘旁边,看指示牌,才知眼前这栋沉默的老房子就是我要寻找的许家大院。天井、回廊、雕梁画栋,满面沧桑却难掩曾经的奢华与辉煌。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房间里却有些幽暗,仿佛多少年的故事都化作细微的尘埃悬浮于空气之中。当徐医生为文朴把脉的时候,不,当徐医生为郁达夫把脉的时候,想必他们的脸上也有着这样的幽暗吧。

《东梓关》里,文朴是第二天早上离开的,从徐家大院走到富春江边等渡船。我没想到许家大院离富春江这么近,近得似乎刚迈出门槛就到了江边。老去的渡口和许家大院一样,静静的,有些寂然,又是那么坦荡。江水悄悄地流,水里的山影树影石影人影层层叠叠,微微荡漾。偶尔传来扑刺刺的声音,原来是江边垂钓之人提起了手中的钓竿,在太阳的照射下,一尾青白色的鱼儿挂在钓竿下方,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直到坐上回家的高铁,我才察觉自己的东梓关之行竟然与那片著名的黛瓦白墙擦肩而过。倒不觉得有多遗憾,富阳这样的地方,终归还会再来。因为那个名叫郁达夫的人,东梓关让我念想,成为我心中渴望抵达的远方。

(摘自《光明日报》)

健康之友

新型脑机接口设备
使中风患者重新“说话”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在英国《自然·神经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利用人工智能算法改进了脑机接口植入设备,使一名失语18年的中风患者能以更接近自然语言的速度将想法转换成语言表达出来。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领衔的研究团队在一名47岁因中风失语的女性患者身上测试了这项新技术。研究者将设备植入患者大脑的语言中枢,借助电极记录了她在脑海中默念句子时的大脑活动,并使用其中风前的声音样本构建了语音合成器,还原出她的声音。随后研究者利用人工智能模型将神经活动转化成语音单元播放出来。

在研究中,患者从屏幕上出现的一组由1024个单词和50个短语组成的句子中默念出100个句子。脑机接口设备从她开始默念句子的前500毫秒起,每80毫秒捕捉一

次她的神经信号,每分钟可“读出”47到90个单词(自然对话的语速约为每分钟160个单词),使其能更接近自然语速。

与早期技术需等待用户思考完整句才能生成语音不同,经改进的脑机接口系统可在3秒内同步完成对患者所思考语句的实时解析与语音转化,而患者此前所用的辅助通信设备完成这一过程需要超过20秒。研究人员说,这一工作原理类似于会议或电话的实时转录系统。快速的语音解码能力有望使患者跟上自然语速,采用患者本人的声音样本还将显著提升合成语音的自然度。

不过,与自然对话相比,新脑机接口设备的运行仍有相当大的延迟。研究人员说,尽管该设备仍处于实验阶段,但他们希望未来它能帮助那些无法说话的人重新获得表达能力。

(据新华社电)

科学新知

中法天文卫星捕捉到130亿年前的伽马暴信号

□刘颖 张建松

记者近日从第十个“中国航天日”启动仪式上获悉,中法天文卫星已探测到超过100例伽马暴,其中一例来自130亿年前的“婴儿期宇宙”,将助力探索更多宇宙起源与演化之谜。

据介绍,伽马暴是宇宙中最剧烈的爆发现象之一,通常由大质量恒星爆炸产生,持续时间从毫秒到数分钟不等。

这次公布的科学成果显示,截至目前,中法天文卫星已探测到了超过100例伽马暴,包括持续10秒的富X射线暴等。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例伽马暴GRB 250314A,来自宇宙诞生仅7.3亿年的极早期。分析表明,它可能源自宇宙最早期恒星坍缩形成的黑洞或中子星。

“这例伽马暴就像一扇时空之窗,让我们得以窥见宇宙婴儿时期的

模样。”中法天文卫星项目中方首席科学家魏建彦说,“这不仅验证了卫星的卓越性能,更重要的是为研究宇宙早期恒星形成、黑洞诞生、致密天体并合等前沿课题提供了全新视角。”

中法天文卫星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是中法两国联合论证研制的空间科学卫星,于2024年6月22日成功发射,是迄今全球对伽马暴开展多波段综合观

测能力最强的卫星。日前,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将中法天文卫星正式交付给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投入使用,进一步推动全球时域天文学观测研究。

魏建彦表示,中法天文卫星预计将在轨工作至少3年,继续搜寻宇宙中的高能爆发现象。期待通过中法天文卫星的观测,帮助科学家理解这类极端天体物理现象的起源和本质。

(据新华社电)

往事随风

情系亭子间

□王本道

古往今来的读书人无不渴望自己的居所中能有一个单独的空间作为书房,在那里读书写作,驰骋思绪。初唐诗人王勃的诗句“直当花院里,书斋望晓开”,即彰显了文人对书房的挚爱。

回望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众多文学家笔底生辉,写下彪炳史册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许多并非出自富丽堂皇的书房,而是写于被称作“亭子间”或类似亭子间的斗室之中。所谓“亭子间”,原指上海石库门建筑的一部分,诞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亭子间一般建在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正房后面楼梯的中间。七八平方米的空间,狭小阴暗,冬寒夏热,大多用作堆放杂物,或作为佣人的住所。旧中国,贫困的市民和小商贩常在此栖身,许多作家也散住于此。

鲁迅初到上海时住的就是亭子间,他的《且介亭杂文》就是在虹口横浜路景云里的亭子间完成的。当时,在附近的亭子间里,还住着叶圣陶、

茅盾等人。鲁迅所住的大陆新村,和瞿秋白住的亭子间仅隔一条马路,二人经常在一起谈论时事、文艺,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瞿秋白在这里写出了《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等12篇杂文,编辑了《鲁迅杂感选集》。巴金曾把自己在亭子间的生活写进小说《灭亡》。周立波在1935到1937年间写过许多文艺评论,后结集出版,书名就叫《亭子间里》。茅盾当年为躲避南京政府的通缉住到景云里,整日隐居,足不出户。正是在这里的亭子间,他第一次以“茅盾”为笔名写出《幻灭》《动摇》《追求》3部中篇小说。方寸之间的亭子间里苦中有乐,蕴含着人生的理想,从而形成了“亭子间文化”。

回忆过往,我也有过自己的“亭子间”。那是1978年初冬,我供职于政府机关,已娶妻生子,还没有固定的住房。为了解决无房户的困难,机关单身宿舍中辟出了几间房,作为年轻夫妻的临时住所。我住的那栋楼属临街建筑,当年楼房设计者为了街容美观,在三楼正中设计出一个尖顶,

分配给我的房间恰巧在尖顶下方,这就使得我除了分得一个房间,又多得了那个尖顶小屋。那间小屋只有十平方米左右,坐北朝南,对我而言可以说是绝好的书房。迁居后我高兴极了,当天就在小屋里摆下一张小桌、一把椅子、一个两米高的书架,把当时自己仅有的一百来册图书全部摆上。其时,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早已开始文学创作。每天晚饭后,待家人熟睡,我便只身进入自己的“领地”读书、写作直至深夜,节假日更是足不出户。那时,当地的报纸副刊有一专栏,专发散文随笔一类的文章,每周一期。刊发前遇有稿件不济之时,编辑便会在头天下午给我打来电话索稿,要求翌日早上上班前务必交稿。往往是接约稿电话忙完工作后,草草吃过晚饭,便进入我那“亭子间”埋头写作。那时身边并无打字机,稿件写成后为留底稿,还需用复写纸抄写两份。这样忙完之后,窗外的街灯已经熄灭,东方甚至显露出熹微的曙色。一年半之后,组织上给我分配了一套60平方米左右的住宅,两室一厅一厨。住房条件大大改善了,然

而我也失去了自己的“亭子间”。事后每每想起还有那些怅然若失。一年半的时间里,寒暑易节,在那个鸽子笼似的空间里,我完成了自己最初的两部散文集的大部分篇章,计20多万字。

光阴荏苒,如今我已退休,诸多文友常常来到我的书房、工作室切磋创作事宜。随着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文友们也几乎都有了各自的书房。我们时常抚今追昔,聊起早年前辈作家的亭子间经历。

一次,有位文友收到某刊物的稿费后,在一间很小的夫妻店请大家小酌。小餐馆举架较高,就餐的餐厅算是厨间上方辟出的一个房间。坐定之后,几位文友突然察觉到,此餐厅的大小和所处位置极像亭子间。于是,前辈作家当年在亭子间的写作经历又一次成为谈论的话题。还有人提出,建议店主人把店名改为“亭子间饭店”。听罢我们的议论和建议,店主小夫妻十分赞赏。此后,文友们不但常来此聚会,还热心地协助店主谋划“亭子间饭店”的改造事宜,演绎了一段与亭子间有关的佳话。

(摘自《光明日报》)



享受阅读

赵军摄